

文化 艺术 教育 丛书

中国文化简史

王瑞成 宋清秀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简史

ISBN 7-5321-2274-3



9 787532 122745 >

定价：16.00元

文 化 艺 术 教 育 丛 书

中国文化简史

王瑞成 宋清秀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简史/王瑞成,宋清秀.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

(文化艺术教育丛书)

ISBN 7-5321-2274-3

I.中… II.①王…②宋… III.文化史-中国 IV.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136 号

责任编辑:徐华龙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中国文化简史

王瑞成 宋清秀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78,000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274-3/I·1826 定价:16.00元

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编委会

主 编:张先亮

副主编:陈芬华 叶志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加丰 王克俭

叶志良 陈芬华

陈华文 张先亮

张继定 金 汉

周文忠 黄云生

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段,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不高的人员急需通过多种渠道,以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的应用能力,尤其是覆盖面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内最早设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需要。经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为了更好地总结办学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

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并决定编写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材,也为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70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历,虽然我们也确定了本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编

2001年4月20日

目 录

总 序	1
第一章 青铜文化:中国政治文化的成熟	1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1
第二节 青铜文化的特征	9
第三节 青铜时代政治文化	27
第二章 诸子百家:中国学术文化的兴起	38
第一节 百家争鸣的盛况	39
第二节 诸子百家的成因	59
第三节 先秦文学和史学的发展	65
第三章 大一统文化:汉唐帝国文化的高峰	71
第一节 政治统一与文化整合	72
第二节 魏晋文化的转折	80
第三节 交流吸纳:文化开放心态与包容机制	84

第四节	辐射与传播:中华文化圈	100
第四章	世俗文化:宋至明清文化	
	世俗化	114
第一节	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	114
第二节	雅文化与俗文化	118
第三节	商业精神与世俗文化	133
第四节	商业文化冲击下的精英文化 流变	144
第五章	外来文化:近代中西文化	
	碰撞与交融	154
第一节	中西文化碰撞	154
第二节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	160
第三节	哲学、文化艺术的变化	165
第四节	俗文化的变迁	170
第六章	新文化:中国文化的重建	
	187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187
第二节	20世纪文化派别和文化 主张	199
第三节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218
后记	234

第一章 青铜文化： 中国政治文化的成熟

中国政治文化相对比较成熟，这种文化成熟的时代又与青铜时代密切相关，所以青铜时代的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二里头文化是我国早期的青铜时代文化，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所谓青铜时代，是指人类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物，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时代。由于青铜文化代表政治文化，因而青铜制作的器皿就成为代表政治文化的礼器，礼器按照一定的组合，代表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礼乐制度，这套礼乐制度在青铜时代对社会制度的维护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瓦解。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当我们走进历史博物馆，总会在古代文化的展览室里，看到陈列着或多或少、大小不同、形制各异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数是由地下发掘出来的，有些出自墓葬，有的出自遗址或窖藏，其中少数是传世品。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化,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而青铜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砌成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19世纪中叶,丹麦的考古学家汤姆生最先提出了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来区分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考古分期法,是根据人类进行社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其中主要是工具来区分的。它不仅揭示了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揭示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律,进而判明当时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就指出:“从来的历史记述,一直不大注意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是不大注意一切社会生活和一切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对于历史以前的时期,人们至少曾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又是根据所谓历史的研究,那就是根据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它分作石器时期,铜器时期和铁器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与那时以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而古代西方地中海沿岸国家如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是与使用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其原因则和当时中国青铜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有密切关系。古代劳动人民使用了青铜制作的工具从事生产,创造出较使用熟铁或可锻铸铁更高的生产率,制作更丰富的手工业产品,开辟更广阔的土地,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西方虽然已较早地发明了冶铁和制作铁器并用之于生产,但是其功效是抵不过青铜工具的。据记载,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大都在公元前10至公元前8世纪初先后进入铁器时期,但长期处于低温炼铁阶段,其产品是块炼铁,可锻铸铁直到公元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才在欧洲出现。所以,在古代东方的中国,在青铜时代即进入了奴隶社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温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等等,但

最重要的在于劳动中较早地掌握了青铜器的冶铸，并用之于生产、生活各种领域，使剩余产品大大增加，使一部分人占有这些剩余产品，逐步形成私有财产成为可能，进而驱使另外的公社社员为之劳动，奴隶主和奴隶即伴随着青铜文化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

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铜石时代。这个铜石并用时代的铜，并不是青铜，而是红铜，所谓红铜就是未经人工模杂的自然铜，红铜也称纯铜。由于红铜器质地软、数量少，人们在生产上仍然以石器为主。但由于原始社会后期冶铜业的出现，农业、畜牧业、各种手工业以及交换的发展等，为阶级社会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前提。红铜的发现是我们的祖先不断在大自然界里寻找石料制造石制农具和工具的过程中而逐渐发现的。红铜具有一定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因此它很易被人们重视和利用，但它质地较软，要作大型的器具很困难，所以，只适宜作小型的工具或者装饰品之类。在我国发现的典型的红铜器，是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武威皇娘娘合一地前后两次就发现红铜器达23件，多是小件工具和装饰品。

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在发现红铜并根据其特点制作一定的工具，无疑这比使用石制工具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十分有限。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锻打和冶炼红铜，逐渐认识和掌握了金属的特点与性能，对青铜器的创制发明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从而过渡到青铜时代。

所谓青铜时代，是指人类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物，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的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具体说来，青铜器，尤其是农具和手工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

了农业手工业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为制造水器、蚌器、骨器、陶器、车马器、武器增加了许多方便。从商周遗址或墓葬出土的马车是非常精巧的,如果继续沿用石、木乃至红铜制的工具,那是不可能的。其次把青铜斧、锯、凿用之于房屋或城堡的建筑才有梁柱结构;用之于武器,方能提高杀伤能力,增强军队的威力;用之于商品交换,金属货币更便于取得等价物的资格,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进而促进其他工种的进步,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的内容。《考工记》记载了段氏、筑氏等几十种工种,而每一个工种的进步,都与使用青铜工具分不开的。有了锐利的青铜刀,可以用之于刻甲骨文,铸制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和水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而可靠的资料。同时更由于它的价值昂贵,又为古代礼器的兴盛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一、青铜礼器

所谓礼器,一般认为是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指青铜器中的鼎、簋、觚、豆和钟、镛等。礼器自然是随着礼仪的出现而产生的。礼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构成部分,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形成的。礼的兴起,是为了向鬼神致敬,而用来表示敬意之物,是饮食,“民以食为天”,鬼神也是这样。至于所用之器,最初不过人类日常所用极其简陋的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器物起了变化。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奴隶主政权进一步被神化,其统治秩序尤其是等级制度进一步礼制比,作为这一秩序和制度的体现物——礼器,也随之日趋完备和制度化。礼器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于奴隶

制度的确立、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二里头文化是我国早期的青铜时代文化。在该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青铜礼器爵和斝。而且爵的数量还比较多,它们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容器和礼器。至商代早期,使用礼器采取系列化配合形式,常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出土。这时的礼器主要有鼎、簋、盘、尊、爵、斝、觚。郑州杜岭街出土的两件大铜鼎,形大质朴,可能是商室使用的“宝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礼器也伴随着礼制的隆盛而日益考究。不仅器类丰富了,更重要的是各种器物的组合,也明显地礼制化。西周前期用鼎已经出现了多个大小相次的组合,后期则愈为完备。《春秋公羊传》中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而且各级鼎的盛放物品也各有规定。如天子的第一鼎盛牛,以下盛羊、猪、鱼、肉脯、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的鼎内则去后两种。卿大夫的第一鼎盛羊,以下有猪、鱼、腊、肠胃等。士则仅有猪、鱼、腊。这是因为地位不同,而规定不同的礼节。

礼器的用场,最主要的是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简直可以说,祭祀是奴隶主阶级的头等大事。所祭的对象,主要是天帝、鬼神和统治者的祖先。统治者通过这种宗教形式,为自己筑起一道保护壁垒,并希望造成对被压迫者的精神威慑力量。从青铜礼器的纹饰看,常用的是各种变形的兽面,以及幻想的龙、凤等。这既保留着早期自然崇拜、鬼神崇拜或图腾崇拜的遗风,保留着礼的起源的某些迹象,同时又对那种遗风加以极大的改造与发展,使它们具有高贵、神圣、诡奇、神秘以至令人恐怖的气氛,一面是奴隶主的自慰与自卫,另一面则是对奴隶的震慑。从青铜礼器的铭文看,字数较多的,大多是宣扬奴隶主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或者是宣扬其祖先的功绩,或者是记述自己受封、受赏的事迹,或是他们对于奴隶、土地的所有权。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礼器对于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以及内部的统治秩序,是有重要作用的。

由于礼器的上述作用,奴隶主贵族就将其中在宗庙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传说,夏禹曾铸九鼎,用来象征九州。夏灭,鼎归于商;商灭,鼎归于周,成为传国重器。春秋时,楚庄王路过周地,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来表示慰劳,楚庄王乘机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即觊觎周室政权,所以王孙满当即驳斥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此后,“问鼎”遂成为企图夺取政权的同义词。不仅九鼎,凡是宗庙所用的重要的礼器,都属于“重器”。那时,灭掉某国,就要将该国的重器掠走或瓜分。在考古发掘中,时常在甲国的墓葬里,发现乙国的礼器,其中不少就是劫掠而来的战利品。

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使奴隶制度“礼崩乐坏”,青铜礼器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使用的规格,打破了旧的礼数。春秋以降,诸侯们的僭越行为日益普遍,大夫僭用诸侯之制的也司空见惯,甚至有的诸侯所用礼器,比天子还要豪华,所用礼器的数目,竟比天子的还要多。这反映了旧的统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的瓦解。第二种变化是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式样。奴隶主阶级礼器的属性渐渐消失,日用生活器物增多。最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作为地位象征的礼器也趋于衰败了。

二、礼器类举

鼎 一般为圆腹、立耳、三足,少数为方形、四足。鼎耳可以穿扛或搭钩。鼎或有盖。鼎原系人类创造的一种烹调器,是用来煮肉的。目前见到的最早实物,有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冈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制钵形鼎、盆形鼎等,其时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稍晚些,陕西宝鸡北鸡首岭出土过造型甚为别致的双联陶鼎。至公元前四千多年河南安阳后冈出土的折沿圆腹鼎,与殷周鼎的基本形制有些接近了。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而且不同的鼎有不同的用场,从而形成了一套用鼎制度。

据研究，鼎有三类：一是饗鼎，用来煮牲及鱼、腊的大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饗字，著名的司母戊鼎便是饗鼎的代表，该鼎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第二类鼎是设食鼎，有的称为正鼎，有的称为升鼎。它的主要功用，是盛放饗鼎煮熟的肉食。第三类鼎是羞鼎，又称陪鼎。羞就是滋味鲜美的调味羹。它是用牲及禽兽肉为主料制成的。饗肉及盛到正鼎内的肉是无滋味的，所以食用时还需要以羞鼎内的羞味调和。以上三类鼎，不同地位的贵族有不同的组合制度。笼统地说，统治者地位越高，用鼎规格就越高。

簋 圆形似碗，敞口，凹圈颈，圆腹、圈足。有的无耳，有的双耳或三耳，或四耳。有的带方座。有的带支足。簋的主要用途是盛黍、稷、稻、粱等熟饭，相当于后世的大饭碗。郑州二里头和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铜簋，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簋。目前已知最大的铜簋，是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周厉王的簋，重60公斤。说明它纯粹是一种礼器，根本无法实用。簋作为礼器，以偶数组合。天子8簋，诸侯6簋，大夫1簋，士2簋，分别与一定数量的鼎等各种礼器相配。

尊 一般为侈口，高颈，鼓腹或筒腹，圈足。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陶尊，可能是用来酿酒的。商代以后的铜尊等，则为盛酒器。有一种形制很特殊的鸟兽形尊，即尊的整体为一立体的鸟兽形状，有盖、有流，且盖流处理的非常巧妙。如夔纹象尊的口盖，设在象背，而盖钮又是一只小象，形成大象驮小象的艺术造形，十分生动。此外，还有鸟尊、鸱尊、犀尊、羊尊、虎尊等，不胜枚举。尊又是酒礼器的通名，所以有些礼器，常自铭为“尊彝”。

爵 口、颈浑一，口侈而狭长，前为流，后为尾。流的根部有两个立柱，柱顶圆帽。也有的两个立柱向中靠拢，合成单柱，圆腹，凸

圜底，三只棱锥足，腹侧有鉴。爵的形制多样，最初可能模仿雀的形状。春秋时期，有的爵就做成雀形。目前发现最早的铜爵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它也是已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到西周晚期爵渐渐消失。被实用、便利的杯子所代替。

觚 大侈口，细腰，高圈足，饮酒之器。在商代以前即有陶觚，考古所见商代最简单或最基本的酒器组合，也是爵与觚。西周中期以后，觚和相关的某些酒器一起衰落了。

禁 长方体，中空，有的上面平素，有的上面有椭圆口三，以承尊、卣之类的礼器，器身前后及左右均有繁缛纹饰或相应数目的长方孔。郑玄说：“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1979年河南浙川春秋楚墓出土了一件铸造精美的铜禁，饰有镂空多层云纹，四周攀附12只虎，又以10只虎作为支足，是件罕见的国宝。

钟 体呈扁圆形，上有柄，钟口两端尖角下垂；钟的正常的放置状态为口朝下，凭借柄的环悬挂在钟架上。钟架的专名为虞，钟本身也有一套名称制度。如钟的柄称为甬，钟口两角称为铣等。这种钟称为甬钟，另外还有以钮代甬的钟，称为钮钟。还有一种钟的口是平的，称为镈。前两种钟可依音阶编列，称为编钟，镈则独立使用，故名之为特钟。钟最早见于西周中期，初为二、三枚一组，一枚钟一般都能奏出双音。以后渐多起来，战国曾侯乙编钟多至64枚。这套编钟的音域达五个八度，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音乐的伟大成就。

鼓 古代的鼓有单面、双面之别，又有陶框（鼓邦）、木框及鼈皮、蟒皮、牛皮等鼓面的不同。商代还有通体皆以铜铸的铜鼓，其形制为双面、横置，上有鸟饰，下有四足，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的铜鼓为矩形足，或称为矩形鼓座。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其形迥异。单面、束腰、中空，腰间有耳，可以侧悬击奏。

至于兵器，自然用于战争及格斗，但也有的脱离了实战的意